

乡土经典 与晋地文学

XIANGTUJINGDIAN YU JINDIWENXUE

XIANGTUJINGDIAN
YU
JINDIWENXUE

XIANGTUJINGDIAN
YU
JINDIWENXUE

许孟陶 著

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乡村文学与文化研究（晋教财2011.118号）

乡土经典 与晋地文学

XIANGTUJINGDIAN YU JINDIWENXUE

许孟陶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经典与晋地文学 / 许孟陶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203-08247-7

I. ①乡… II. ①许… III. ①乡土文学—文学研究—山西省 IV. ①I20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5877号

乡土经典与晋地文学

著 者: 许孟陶

责任编辑: 吕绘元

助理编辑: 史美珍

装帧设计: 陈 婷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ecb@163.com 发行部

sxske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e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省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71 千字

印 数: 1-700 册

版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8247-7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三里湾》与《创业史》比较分析

第一节 两部小说的基本政治立场	003
(一)政治立场的共同之处	003
(二)政治立场的不同之处	005
第二节 两部小说的总体艺术风格	017
(一)戏剧与史传	017
(二)现代与传统	023
(三)通俗与博雅	026
(四)急促与舒缓	034
第三节 两部小说的主要叙事方法	037
(一)展示与讲述	038
(二)视点与距离	041
(三)象征与讽喻	044



(四)场景与对话	050
(五)心理与细节	057
(六)环境与风景	062
(七)命名与指代	065
(八)宏大与日常	068
第四节 两部小说的经典价值及时代局限	072
(一)两部小说的经典性表现	074
(二)两部小说的非经典性表现	082
(三)两部小说的当代价值	090

第二章 传承与出新:从赵树理到葛水平

第一节 乡土小说写作:普世性母题叙事的演绎与流变	098
(一)渊源与阈限	098
(二)“三画”与“四彩”	100
(三)人文与类群	102
(四)时序与流派	104
第二节 赵树理写作:时代风云中的潮起与潮落	107
(一)启蒙与革命	107
(二)通俗与写实	111
(三)环境图与风景画	116
(四)问题小说与小说问题	120
第三节 葛水平写作:多元化格局中的探索与收获	125
(一)尝试与拓展	125
(二)底层与女性	130

(三)日常与非常	135
(四)感觉与诗性	140
第四节 同类同根写作:语境变化中的传承与出新	143
(一)新启蒙与后革命	144
(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151
(三)情感表达与人性探幽	155
(四)乡土坚守与文学追求	161
(五)共性观察与个性辨识	173
第五节 后赵树理写作:企盼山西文学繁荣的命名与呼唤	176
(一)命名与热议	177
(二)效应与启迪	179
(三)问题与建议	184
(四)后赵树理写作与葛水平	187

第三章 重评《十里店》 回望赵树理

第一节 《十里店》的内容与特点	193
第二节 《十里店》的写作与修改	196
第三节 《十里店》的戏里与戏外	200

结语	207
-----------------	------------

主要参考文献	210
---------------------	------------

后记	212
-----------------	------------

第一章 | DI YI ZHANG

《三里湾》与《创业史》比较分析

赵树理和柳青,都是成长于革命根据地,成名于解放区的老一辈革命作家。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就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初,他们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长期深入山西和陕西的农村,与农民同甘共苦,凭借强烈的政治热情、坚持不懈的写作精神、雄厚的生活积累和扎实的文学功底,先后写出了讴歌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和《创业史》(第一部)(以下提到《创业史》时均指第一部)。赵树理的《三里湾》讲述的是 1952 年发生在晋东南太行山区一个农村的故事,柳青的《创业史》讲述的是 1953 年发生在关中平原渭河流域一个农村的故事。《三里湾》于 1955 年在《人民文学》1 期至 4 期上连载,同年 5 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单行本;《创业史》于 1959 年以《稻地风波》为名在陕西省的文学刊物《延河》上连载,1960 年初《收获》杂志以《创业史》为名转载,同年 5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单行本。两部小说当年出版后

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引起了权力机构和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一时好评如潮。《三里湾》被认为是“反映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第一长篇”,《创业史》则享有“反映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史诗”的盛誉,两位作家也因此再度名满华夏。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们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一位在批斗中悲惨地死去,一位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两部小说也随之陷入了批判的深渊。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全国拨乱反正的进行,赵树理的冤案得到昭雪,柳青很快带病复出,两部小说也重新得以面世,大量地出版发行,并继续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但是,那场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原有面貌,并深刻地触及到中国农民灵魂的合作化运动,距今已将近六十年。两部小说问世也已半个多世纪,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农村毕竟经历了一个由个体经营到互助合作,再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今天,随着涂抹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身上的政治色彩逐步剥落,两部小说的出版和阅读仍在持续,但对合作化运动的评价却出现了较大的争议,这使为它高唱赞歌的两部小说饱尝了酸甜苦辣。虽然两部小说已不像昔日那样声誉显赫,但它们依然受到文坛内外的关注和广泛评述。在这些评说中,大体有三种值得重视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认为两部小说虽然有一定的时代和政治局限性,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对我们了解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它们的艺术光彩在时间的冲刷下魅力犹存。第二种意见是既否定又肯定,即对两部小说在政治上完全否定,只承认其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第三种意见是彻底否定,认为它们从政治角度来看毫无价值可言,极端者甚至认为此类“鼓吹农业合作化的文艺作品是当年饿死农民的帮凶”(茆家升);从艺术角度来看,两部作品明显违背了小说写作的伦理,充当了受政治意识形态支配的话语工具,属于典型的功

利主义文学和遵命文学。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由于两位作家都擅长写乡土小说,《三里湾》和《创业史》分别作为晋地小说和秦地小说的代表,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两位作家在家乡也拥有大批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即使在当下,他们的作品仍然得到当地文坛的高度评价,被当作重要的文化遗产来供奉。在山西,对赵树理的评价高于柳青;在陕西,对柳青的评价则高于赵树理,两地出现了各赞自家前辈高的现象。鉴于此,本文拟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从四个方面对《三里湾》和《创业史》做一些必要的和力所能及的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第一节 两部小说的基本政治立场

《三里湾》和《创业史》都是政治性很强的乡土小说,都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分析它们必须首先从作品体现的政治立场入手。通过比较发现,两部小说虽然都极力讴歌当年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但它们所表达的政治立场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弄清这一点是搞好比较分析的前提。

(一)政治立场的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八方面:

1.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具体到农村,就是要以互助组和合作社逐步取代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这一取代过程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由两位作家用不同的素材体现在两部小说中。《三里湾》是以一个老解放区农村 1952 年所发生的故事来反映这一主题,《创业史》则是以一个新解放区农村 1953 年所发生的故事来反映同一主题。

2. 合作化运动方针政策完美无缺,一直受到农村广大党员和绝大多数农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执行。在合作化运动中,中国的县、区、乡三级党政基层干部普遍大公无私,勤政廉洁,不仅能深入基层,扎根农村,同

群众打成一片,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办事,而且还能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当好引导农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带头人。《三里湾》中塑造的众多基层干部形象,比如长驻农村的县委刘副书记、专署农业科何科长、张信副区长、画家老梁等,都是这样的人;《创业史》中塑造的县委陶宽书记、杨副书记,区委王书记、下堡乡的卢支书和农技员韩培生,也是这一类人物形象。

3. 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度是万恶之源,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在农村走合作化道路就是要消灭这种万恶的制度,并以新的公有制取而代之。《三里湾》和《创业史》中的富裕农民就是因为留恋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度,才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绊脚石。

4. 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造就了农民愚昧、落后、自私、狭隘、保守的性格,这严重阻碍了合作化运动的开展,所以,在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主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合作化运动才能解决。《三里湾》中落后农民马多寿和王申由反对入社到积极入社的转变,以及《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最后觉醒,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5. 农村中的贫下中农,尤其是他们中的年轻人,最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最愿意响应党的号召,而且越是贫穷越是急于改变自己现状的年轻人,革命态度就越坚决,所以,他们既是合作化运动的急先锋,也是党在农村工作中应当依靠的中坚力量。《三里湾》中的青年农民王金生、王玉生、王玉梅、范灵芝和王满喜,《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徐改霞、高增福、任欢喜和冯有万都是这方面的典型。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则不乐意加入互助组和合作社,他们构成了合作化运动前行的阻力。《三里湾》中的马多寿、王申和袁天成,《创业史》中的郭庆喜、郭世富和梁老大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6. 对于合作化运动,党内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反映在农村,就是一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土改中坚决跟党走的老党员,他们或因在土改中多分了好土地,或因家庭有充足的劳动力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好条件,极易以富裕中农为榜样,走上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他们同热衷于合作化运动的其他农村党员之间,必然产生激烈的矛盾。《三里湾》中以王金生为首的进步党员同范登高、袁天成等落后党员之间的矛盾,《创业史》中梁生宝同郭振山之间的斗争,都属于这类性质。

7. 在中国农村,只有走合作化道路,才能大规模地兴建农田水利工程,才能大面积地推广新技术和新设备,才能充分发挥劳动协作的优势,从而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产量,最终解决“三农”问题。《三里湾》中写到的合作社进行开渠工程和应用篱笆排沙法,以及对农具进行一系列革新改造,体现的就是这一点;《创业史》中写到的互助组大力推广新稻种、新式育秧法和耕作法、七寸步犁、解放式水车,以及对化肥和杀虫剂的应用,触及的也是这类问题。

8. 两部小说都肯定地认为,在农村,加入互助组一定比单干好,加入合作社一定比互助组好,走合作化道路必然会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过上幸福生活。为此,《三里湾》通过秋收时合作社、互助组和单干户在三个打谷场活动的对比,来说明合作社的劳动效率和农作物产量明显比互助组和单干户高,并通过画家老梁为三里湾画的三幅画,向农民展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前途;《创业史》则通过梁生宝互助组当年水稻的大丰收和它给农民带来的幸福生活,来显示互助组的优越性。毫无疑问,两部小说正是因为有了以上政治立场上的共同之处,才使它们被划归为同一类型的文学作品。

(二)政治立场的不同之处。同样写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时间仅相差一年,但阅读时能明显体会到两位作家在

政治立场上的诸多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六方面:

1.《创业史》描写了农村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三里湾》却没有。在赵树理笔下,三里湾无论是单干户,还是加入互助组或合作社的家庭;无论是光棍汉还是大家族,虽然有穷有富,但基本上都能安居乐业,根本没有像《创业史》中的高增福那样整天“穿着开花破棉袄”,像任老四那样常年全家“缺吃少穿”的农民。人与人除了在思想上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家与家除了对入社的态度不同以外,其他方面的差别似乎不太大。而柳青笔下的蛤蟆滩则是另一番景象,土改结束以后,“不贫困的庄稼人,开始和贫困的庄稼人分化起来”,有些庄稼人由于天灾人祸,生产和生活都陷入了困境,如贫农高氏兄弟,哥哥高增荣因为双腿有病不能干重活,加上老婆坐月子,无法度过春荒,而弟弟高增福因为死了老婆,又卖掉了用贷款买来的耕牛,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儿子异常艰难。党员村干部郭振山兄弟三人则因为“兵强马壮”,加上土改时分得很多好地,所以年年有余粮,开始有条件买地。1951年,他们“从下堡村钉鞋匠王跛子手里,买了这二亩桃林地”,接着又暗中在一家私营砖瓦窑投资入股。梁生宝的堂哥富裕中农梁生禄也从瘸子李三手里买了一亩多地。这种有人青黄不接时被迫卖地,有人买地走自发道路的状况,就是两极分化。什么是自发道路?梁生宝给后爹梁三老汉通俗地解释道:“爹,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咱分下十亩稻地,是吧?我甬领导互助组哩!咱爷俩就像租种吕老二十八亩稻地那样,使足了劲儿做。年年粮食有余,有力量买地。该是这个样子吧?嗯,可老任家他们,劳力软的劳力软,娃多的娃多,离开互助组搞不好生产。他们年年得卖地。这也该是自自然然的事情吧?好!十年八年以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咱爷俩名下了。咱成了财东,他们得给咱做活!是不是?”对此,柳青在《创业史》中郑重其事地提醒道:贫雇农在土改后要是“失掉了对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控制,要是没有什么新国法治他们,

那还得了？几年工夫，贫雇农翻身户十有九家要倒回到土改以前的穷光景去”。农民为什么必须走合作化道路，赵树理通过《三里湾》给出的主要理由是为了让农民都过上富裕的生活，而柳青通过《创业史》给出的主要理由是为了防止旧社会的剥削制度在农村复辟，在这方面，二者的政治立场泾渭分明。

2. 《创业史》描写了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三里湾》却没有。在《三里湾》中，没有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也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大地主刘老五早就灰飞烟灭，阻碍合作化运动进程的主要是残余的剥削阶级思想和新兴的自发势力，虽然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先进思想与落后观念的冲突在书中此起彼伏，虽然对加入互助组和合作社有人公开抵制，有人阳奉阴违，但始终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所有的冲突都没有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在《创业史》中就完全不同了，书中对农村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做了大量生动形象的描述。虽然大地主杨大剥皮和吕二细鬼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富农姚士杰重新成了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富裕中农郭世富等人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向贫下中农和合作化运动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猖狂进攻。书中写到，富农姚士杰对新社会有着刻骨的仇恨，以至于在路上“听见如果有人骂拥护新社会的任何人，他都感到兴趣。他不由自主地要凑到跟前去听听，听了觉得心里很舒畅”。“他最喜愿听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号召的事情，发生了问题。听见什么地方有了问题，他走路脚步也轻快了，回家能够吃一老碗饭，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为了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增添一点麻烦，他常常不惜血本，“在城市和乡村粮食紧张的那些日子里，只要能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增加一点点困难，他就要干。他说的“他要钱做啥？”他看到春荒时党在蛤蟆滩发动的活跃借贷失败，“从心里到皮肤，浑身上下说不出的舒坦。他好像吃了一服什么药，他吸水烟，



在井台上绞水,在马房里垫土,都特别带劲儿。甚至于咳嗽的声音,也比往日大些,吐出去的痰像出了膛的子弹一样”。为了瓦解梁生宝的互助组,他私下里借粮给兵痞白占魁和贫农高增荣,千方百计引诱王瞎子的儿媳妇赵素芳到他家打短工,暗地里支持郭世富买新稻种同梁生宝互助组较量,鼓动白占魁与郭锁合伙买牛。王瞎子因儿子拴拴同梁生宝进山割竹子时受了伤,坚决要求退出互助组,姚士杰听了竟“高兴得眼光闪闪发亮”。但不管阶级敌人的进攻如何猖獗,以梁生宝和高增福为代表的贫下中农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最终不仅扩大了自己的互助组,而且还成立了下堡乡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柳青在《创业史》中通过上述故事企图雄辩地证明: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更快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依照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赵树理在《三里湾》中把农民分成三大类:以王金生、王玉生为代表的党内先进分子,以范登高、袁天成为代表的党内动摇分子和以马多寿、王申为代表的党外落后分子。柳青在《创业史》中则把农民分为四类,除了以上三类之外,又加了一类以姚士杰和郭世富为代表的敌对分子。这就进一步说明,在以阶级斗争理论和以阶级分析方法指导创作上,柳青的确比赵树理要自觉和深刻得多。

3.《创业史》是在城市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描写合作化运动,而《三里湾》只是单纯地写合作化运动,对工业化只字未提。1953年是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全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高潮,这不可能不对合作化运动产生影响。《创业史》从三个方面体现了这种影响的存在:一是让农民强人郭振山敏锐地觉察到工业化对农村的重要性,“在城市向农村第一次要人的时候”,他率先让自己的三弟郭振江“到西安电厂里去当学徒工”,并认识到农村青年进城就是“支援国家工业化”。为此,他反复动员自己的崇拜者、邻居女青年徐改霞进城当工人。当徐改霞的寡母对此心存疑虑时,他对老人说:“我的天!大城市要建设社会主义哩

吗,俺党团员不去,谁去?”当徐改霞不想放弃同梁生宝的爱情,在报考国棉三厂的问题上动摇时,他诚恳地劝道:“人家到朝鲜都抢得去,叫你参加国家建设,你不情愿去吗?那么,咱国家要这些党团员做啥?”乡里的卢支书得知徐改霞想进城当工人,就介绍她进了西安铁路机车修配厂,后来她又到北京长辛店铁路机车厂接受培训,从而使《创业史》中唯一的一个爱情故事在众人的遗憾声中中止。二是用诗一样的语言,对城市的工业化形势做了动情的概括:“一九五三年春天,是祖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春天。大地解冻以后,有多少基本建设工地破土动工了呢?有多少铁路工程进入了施工阶段了呢?……一九五三年春天,西安市郊区到处是新建筑的工地,被铁丝网或竹板篱圈了起来,竞赛红旗在工地上迎风飘扬。……一九五三年有多少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握别了多年一块同甘共苦的同志,到筹建工厂的工地和新认识的同志握手交欢呢?”三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通过对几个典型场面的描写,反映了1953年12月底全国实施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并以引述党的决议的方式,指出农村只有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才能一步一步地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的产量,才能使所有的农民真正脱离贫困的境地,而日益富裕起来,并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商品粮及其他农产品”。这就表明,合作化运动不仅事关农村的发展,而且影响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合作化也好,粮食统购统销也罢,其根本用意在于以农民的劳动积累来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由于涉及到国家工业化,《创业史》的政治视野就显得更为开阔。

4. 《创业史》通过写农技员下乡推广新技术,涉及到知识分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问题,而《三里湾》没有。《三里湾》中虽然也刻画了一个下乡知识分子的形象,即画家老梁,但叙述的重点在他画的三幅画的内容,以及一些画画的过程,对他在乡下的工作生活和接受贫下中农教

育的情景并没有涉及，他的出身经历和思想性格在书中一概模糊不清。可《创业史》却不惜笔墨，下大力气塑造了下乡的农技员韩培生的形象，对他的长相、衣着、精神风貌，以及下乡后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形都做了详尽的描述。韩培生通过与梁生宝妈、梁三老汉，以及共青团员任欢喜的长期接触，通过听到的梁生宝事迹和最后看到的梁生宝形象，不仅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有了深刻的了解，而且被梁生宝妈的朴实善良、梁三老汉的勤劳耿直、任欢喜的天真热情，以及梁生宝的赤胆忠心深深打动，从而受到了一次机会难得的教育，让他“在人生的道路，又向前跨了一步”，进而认识到“人，不论文化程度高低，只要不计较个人利益、个人得失，就会有惊人的勇气、坚定的胆量！”从此，他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坚定了在互助合作运动中争取入党的决心”。神化底层，从底层民众中挖掘高尚的精神资源，来教育和改造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是延安文学的政治传统。柳青的《创业史》走的正是这条路子。

5.《创业史》对它所描写的正面人物，在政治上都进行了极大的拔高，在道德上都进行了刻意的神化，而《三里湾》没有。《三里湾》中的主要正面人物王金生，《创业史》中的主要正面人物梁生宝，都是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但他们在两部小说中的表现却截然不同。王金生不过是一个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朴实无华的农村党员干部，而梁生宝则是一个高大完美、超凡脱俗的英雄人物。王金生作为三里湾的党支部书记和合作社副社长，口不说大话，行不见高尚，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不是主持支部会议研究扩社等具体问题，就是带头整党；不是解决秋收分配和开渠中出现的麻烦，就是调解各种各样的家庭纠纷。他的斗争性好像不是太强，以至于在整党中面对范登高的自发倾向展开批评时，显得顾虑重重。他是一个身陷日常工作的事务主义者，也是芸芸众生之一。同王金生相比，《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虽然只是一个预备党员、人民代表和互助组

组长,但他不仅思想先进,敢想敢干,党性纯洁,品德高尚,而且平时所抓的工作都是大事和要事,出口说的都是豪言壮语。在入党宣誓时,他念毕誓词后又动情地讲了一段话:“毛主席!我是讨吃娃出身!十冬腊月,我跟俺妈到蛤蟆滩落脚,我是光着屁股来的。我长大了,为私有财产拼过命,也没算啥!我这时要加入你这光荣的党了,我啥也不谋。穷庄稼人都有办法,我就有办法!我决不辱没党的名誉……”他立下的人生抱负是:为了人民的事业,他愿意把自己讨饭娃子不值钱的生命投了进去,永无反悔!他面对区委王书记表示:“海枯石烂,咱心不变!党指到东,咱上东!党指到西,咱上西!”他不仅有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信心,而且还有解放全人类的气概,所以才能力排众议,吸收兵痞白占魁到自己的互助组。他总是吃苦在先,享乐在后,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为了互助组的水稻能丰产,他自垫路费外出购买新稻种;为了帮助更多的困难户度过春荒,他身先士卒,义无反顾地带领大家进山割竹子;为了巩固互助组,成立合作社,他拒绝了心仪已久的好姑娘徐改霞的追求。他有很强的党性原则,考虑问题时总是从党的利益出发,从不感情用事、草率行事。当党组织对他表示信任时,他总觉得党错爱了自己,心中感到相当的不安。党是不是把他看得太高了呢?他是不是真的对党改造农民有很大的用处呢?当群众对他的工作表示支持和满意时,他认为“这表示基本群众多么乐意党指示的方向啊。群众的赞成,就是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最高报酬”。他懂得孝敬老人,善待邻居,深得贫下中农信任。他为互助组买回新稻种后,他宁肯自己少留也要先满足乡亲们的需要。总之,在《创业史》中,梁生宝是一个完全符合无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理想人物。

6. 《创业史》集中笔墨、紧扣主题写合作化运动,而《三里湾》并非如此。《三里湾》在写合作化运动时,插入了大量与合作化运动毫无关系的日常琐事,如王玉生与袁小俊小两口仅仅因买不买一件棉绒衣而闹得离